

用胜利为新中国诞生献礼——

战略追击抵南粤

■王凤春

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在这举国欢庆的伟大日子里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《告广东人民书》，号召广东省军民紧急动员起来，全力支援我军入粤作战，解放广东，解放全中国。在广东各边纵队配合下，我军长驱南下，于10月14日解放广州，接着直下南粤，至11月4日，广东战役以我军胜利宣告结束，为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献上一份厚礼。

周密筹划充分准备。1949年6月，第四野战军主力自武汉及其东西地区分三路渡江南进，遵照中央军委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，对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、余汉谋集团展开战略追击。其中，东路军由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（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）组成，任务是从赣州经南雄、始兴南进，在华南游击队的配合下，分三路合围广州。

广东省位于我国大陆最南部，其省会广州市被称为我国的“南大门”，是华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因此，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广东格外重视。国民党反动政府从南京撤至广州后，代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要人白崇禧、余汉谋、薛岳等举行会议，商讨两广合力固守广东问题，并要求余汉谋率部“巩固粤北、确保广州”。此外，在1949年7月至9月，蒋介石先后3次飞往广州，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制订《扭转时局方案》，企图“全力保卫广州”。

当时，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，除粤系余汉谋部外，还有方天所部、胡璉残部及第21兵团残部，连同其他地方武装共计约15万人。余汉谋将其主力置于粤汉铁路（今京广铁路南段）的广州至曲江（今韶关市）一线，形成三道防线，控制湘赣入粤的铁路、公路及水路咽喉，企图阻止我军进军广东。一旦广东不保，余汉谋拟率部逃往雷州半岛、海南岛或广西。

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两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，于8月1日任命叶剑英、张云逸、方方分别为华南分局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书记，华南分局受华中局的领导。9月上旬，叶剑英抵达赣州，召集广东战役参战部队负责人举行作战会议，在分析形势的同时，进一步研究了解广东的作战计划，并上报中央军委。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赣州会议的决议，并针对余汉谋部层层设防的特点，第四野战军前委研究拟制了作战方案，上报中央军委并得到批复同意。具体部署是：以陈赓第4兵团为右路军，以邓华第15兵团为左路军，以两广纵队、粤赣湘边纵队、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分三路入粤，先夺取曲江、翁源，而后攻占广州，力求在广东境内歼灭余汉谋集团。参战部队统一由陈赓指挥。



《人民日报》关于解放广州的报道。



解放军入城部队经过广州长堤。

方案既定，华南分局各级党委、政府和参战部队开展了紧张的作战准备工作。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，进一步确定了作战方针、作战计划、支前工作和城市接管等问题。参战部队在进行休整恢复期间，主要做好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，针对广东地形特点进行山地、河川战斗的战术训练和轻装战术训练，并对伤病员进行及时治疗。广东境内各游击纵队主要做好全力配合和支援野战军行动工作，协助扫除野战军进军广东的外围障碍，安排人员做好城市保护工作，为战役行动提供准确的情报，在可能情况下做好分化瓦解敌军工作。地方政府主要做好筹粮、修路、救治等支前工作，为野战军作战提供最大后勤保障，并做好欢迎野战军入粤之准备，保障野战军顺利通行。

急攻速占直取广州。10月2日，进军广东的我军按照预定部署，向余汉谋部发起攻击。右路军第4兵团分三路直击曲江。左路军第15兵团兵分两路直指翁源、新丰。6日至7日，翁源、曲江相继被解放，使粤北门户洞开，各路军继续勇向南推进。

余汉谋为迟滞我军向广州推进，急忙研究部署广州前哨的防守力量，企图在英德、佛冈、清远、从化、花县一带布置一道“最后防线”作负隅顽抗。陈赓根据敌情变化，令各路军乘敌军部署尚未就绪之际，展开全线攻击。各部队接到命令后，不顾疲劳，昼夜兼程，长途奔袭，先后占领英德、清远、佛冈、花县、从化，基本肃清广州外围的残敌，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。

11日，我军强势逼近广州。李宗仁紧急召集阎锡山、顾祝同、余汉谋、薛岳等人，作出将总统府、行政院撤至重庆和广东省政府撤至海南岛的决定。次日日晚，顾祝同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决定把防守广州的余汉谋部撤至雷州半岛和海南岛。会后，李宗仁、阎锡山、顾祝同、余汉谋、薛岳等弃城而逃，整个广州城陷入混乱。获悉守敌主力自广州西逃，陈赓马上调整部署，令右路军沿敌西逃之线追堵，南路军在敌南逃之路上进行阻击，左路军则继续向广州市区攻击。14日21时许，左路军第43军128师382团率先从广州东北郊进入市区，占领总统府、行政院、省政府、警察局等机关，并在黄沙火车站歼灭未来得及逃跑的敌军1000余人；379团向海珠桥进攻，堵截向南逃跑未来得及上船的敌军一部，并将其歼灭。与此同时，第44军132师从东郊进入广州市区。10月15日凌晨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东亚大酒店，广州解放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。

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掩护撤退时，还蓄意破坏粤汉铁路、天河机场、白云机场、军械军需仓库、海珠铁桥等重要基础设施，试图搬运部分企业设施到海南或香港，让我军得到一座“空城”。对此，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保护广州城的斗争。他们通过报刊、广播、传单等方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、鱼死网破的阴谋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保卫自己的财产，在有组织的护厂、护校斗争下，广州城市公共设施和企业设施大部分免遭破坏。同时，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还发动和领导了国民党广州市保安警察部队、市政府常备自卫队起义，担负起警戒和保卫任务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作出积极贡献。

风卷残云追歼逃敌。广州解放后，余汉谋部第21兵团、第4兵团残部和第39、第62军由陆路向粤西溃退，第63、第109军由水路向粤桂边境逃窜。得知余汉谋部已撤退，在左路军进占广州后，陈赓命令右路军不进城，直接向南

及西南猛追逃敌，各追击部队从近从快展开平行追击、超越追击和尾后追击，切断余汉谋部入桂、入海通道，最后实现合围聚歼。

经过8天追击，右路军第4兵团在连续多日急行军后，终于将余汉谋部包围于阳江西南白沙圩至平冈圩东西5公里、南北10公里的地域内。26日晨，第4兵团发起总攻，10余支突击部队以锐不可当之势向敌军冲去，共歼灭余部4万余人，少数敌人逃跑或落海淹死。在围歼敌人的同时，解放了云浮、罗定、茂名、信宜、廉江、化县（今化州市）等县城。

鉴于华南地区的军事形势，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前委和第15兵团稳住脚跟，肃清广东境内残敌，进一步巩固广东境内解放区，“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……不要进攻雷州半岛，更不要进攻海南岛”。11月2日至4日，第15兵团根据这一指示，协同两广纵队、粤赣湘边纵队在广东省境内共肃清余汉谋残部近4000人。

广东战役历时34天，我军共歼敌6.3万余人，其中俘虏4.2万人，缴获各种火炮714门，各种枪3万余支（挺），汽车150余辆，弹药260万发，解放县城38座。

1949年11月6日，我党领导下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成立。广东这片红色热土，见证了中国共产从党从新生到强大，南粤大地不仅是地理版图上的人口，也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中国民主革命滚滚洪流的人口，新生的民主政权和共和国在这里面朝大海、奠基立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和前沿阵地，在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领跑全国，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。



解放记忆



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薛庄镇李行沟的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。

杨雷转移到村子里更加隐蔽的位置，比如地窖或柴房。有一次，敌军突然来村子搜查，高义峰临危不乱，他让杨雷躲进地窖，然后在上面盖上一些杂物，自己若无其事地在院子里干活。敌人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，只好悻悻离开。就这样，在当地群众掩护下，与敌军周旋了30余个日日夜夜，杨雷顺利躲过敌军数次“清剿”，最终成功脱险。

抗大一分校第2大队政治教员周抗，在突围中腿部负重伤。当地一个老大娘发现了他，并将他藏在一个山洞里。老大娘和儿子冒着生命危险，在敌军的“扫荡”中，为周抗送饭送水，直到他伤愈归队。

大青山突围战结束后不久，山东纵队第二医疗所医护人员忍受着饥饿和疲劳，白天躲进山洞隐蔽，夜晚逐个山洞给伤员换药。当地群众也冒着生命危险，配合医疗所的同志一起救护伤病员，并为伤员送粮送饭。在当地军民的共同努

大代价。战斗中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及其夫人辛晓，第115师敌工部部长王立人、德国友人、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·希伯，抗大一分校第2大队政治委员刘慧东等200余人英勇牺牲。

在这场惨烈与悲壮的突围战中，沂蒙军民患难与共、水乳交融，铸成了军民一心、兵民一家的铁壁铜墙。八路军将士们毫不退缩，舍生忘死，用自己的身躯筑成坚固防线，全力掩护群众转移。而淳朴善良的沂蒙群众，同样怀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，冒着生命危险为200余名八路军伤员提供隐蔽之所和悉心照料，使他们在敌军反复“清剿”中安全生存，这是山东抗战史上的奇迹，也是沂蒙军民鱼水情深的最好体现。

战斗中，抗大一分校第5大队2中队9班副班长杨雷奋勇抗敌，身负重伤后与部队失联。突围后，他强忍伤痛，艰难地躲避敌军的搜捕。当费县村民王立德发现杨雷时，他已十分虚弱，身上的伤口血流不止。王立德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将杨雷背到附近的青石山洞里养伤。随着敌军加大对山区的搜查频率，杨雷又被沙沟峪村村长孙兴林转移到南涝村村高义峰家中。然而，敌军的搜捕行动一刻未停。高义峰和其他村民时刻保持着警惕，轮流在村子的各个路口放哨。每当听到有敌军靠近的消息，他们就迅速把

一门山炮的万里长征

■杨润鑫 宋可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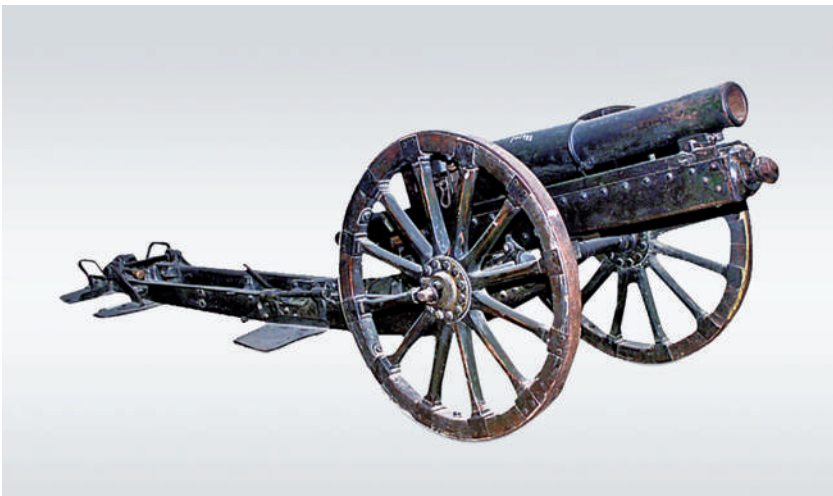
万里跋涉来到陕北时，红军最初携带和途中缴获的重型武器装备已所剩无几。有一门山炮却被红军战士万分珍视。一路马驮人扛，红军战士将这门山炮带到了陕北。这门山炮编号587，名为“七生五过”。生，是英文“厘米”的音译，“七生五过”即口径75毫米。该炮由上海兵工厂于1927年模仿德国克虏伯75毫米口径山炮制造，炮身长1050毫米，最大射程4300米。这门山炮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并不稀奇，它能让红军战士丢弃其他辎重装备，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将它带到陕北，这就和它不同寻常的经历有关。

1935年4月，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第58师师长陈耀汉在得知红2、红6军团决定开赴湖北、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后，急令所辖两个旅先行出发，与自己 and 西面的张振汉部合力截击，妄图歼灭红2、红6军团。红军在陈家河利用有利地形，率先歼灭敌军两旅中的172旅。陈耀汉闻此消息慌忙回军。随后，红军冒雨急行军赶往陈耀汉南窜的必经之路桃子溪，对敌发起猛烈攻击。此战，红军歼敌一个师部和近两个旅，缴获大量武器装备，这门山炮便是其中之一。这对于缺少重武器的红军来说，可谓如获至宝。红军立即用该炮装备自己的炮兵营，投入反“围剿”作战。

同年6月，在忠堡战役中，红军炮兵营用山炮配合步兵作战，一举炸毁敌军碉堡，敌军司令张振汉被俘。经过红军的思想教育，炮兵专业出身的张振汉加入红军，成为红军学校的教员。在随后的龙山围困战中，张振汉还亲自上阵操作这门山炮，两发炮弹就摧毁了敌军一座碉堡。

11月，红2、红6军团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，这门山炮也随着红军指战员踏上漫漫征途。突破乌江时，红军利用这门山炮协同其他武器压制住对岸的国民党军火力，为红军战士抢渡乌江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
长征途中，为携带这门重达几百公斤的山炮，红军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，宁肯饿肚子、吃苦流汗、手抬肩扛也不舍得丢掉。过草地，炮身太重无法拖行，红军战士就把山炮拆开来，



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。

形如月牙疾如风

——中国古代长兵器之铲

■曹波

古人使用的兵器，很多是由农业生产工具演化而来，铲便是其中之一。早在新石器时代，人类就已用石头制出简单的铲。他们通过打磨大石块，让石块形成一头略宽、一头略窄

的造型，略窄的那一头打磨次数更多，因而更加锋利，可以用来挖土、铲泥。商朝时期，出现了青铜铲。战国晚期，古人开始使用铁铲。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战争频发，古人在农民起义中将类似于铲的农具或工具当成武器使用。正规军队构筑营地或城墙时所用的铲也常常被用作武器。铲开始向兵器演化。

明朝时期的军事家开始重视铲等长柄武器，他们认为铲“薄体阔刃”的特点，在骑兵作战中可以起到辅助攻击的作用。于是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月牙铲问世，也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铲的形制。月牙铲铲头一般为铁制，刃部呈月牙弧形，采用套装柄，柄为木制或铁制。根据月牙朝向不同，可分为牙向内的内月牙铲和牙向外的外月牙铲两种。《三才图会》中的“天蓬铲”，内外皆有锋刃，宽二尺左右，柄长八九尺或一丈，是典型的内月牙铲。这种铲直推可以削手，往上推则铲首，向下推则铲足，还可扬沙扬尘，用法多样，被明朝布衣军事家郑若曾誉为“兵马步战第一利器”。《武备志》中记载的外月牙铲，除铲头月牙朝外，与内月牙铲

形制无太大区别。无论是内月牙铲还是外月牙铲，柄的尾部都装有尖刺，可用于刺击。在月牙铲的基础上，又演化出金钟铲、莲花铲等多种形制的铲。

与刀剑戈矛相比，作为兵器的铲虽然处于次要地位，但在修行之人的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，成为随行器具，即“方便铲”。这种铲为双头铲，一头为外月牙铲，一头为斧状铲，有的铲头开孔而穿环，舞动时声声作响，以增势威。有些铲会在铲头和铲柄连接处缀以红缨。对僧侣来说，这种铲既可充当扁担，又可在遇到猛兽或强盗时，充当驱逐防身之利器。明朝时期成书的《水浒传》中的鲁智深和《西游记》中的沙僧，所持的兵器正是这种“方便铲”。铲后来成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武术器械，演练时有推、压、拍、支、滚、铲、戳、挑等击法。



战国铁铲。



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